



向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学习

向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学习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一·十二·杭州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

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新民主主义论》

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

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

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反对党八股》

鲁迅言论辑录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

《鲁迅书简》（下）

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域，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

《鲁迅书简》（下）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即田汉——编者注）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鲁迅书简》（下）

革命的文学者，就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复的暗探了，……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卷四

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

《三闲集·铲共大观》《鲁迅全集》卷四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卷四

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卷四

不同那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人，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在资产阶级如此，在无产阶级也如此。

《南腔北调集·又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卷四

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

“都带”，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

《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卷四

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

《坟·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卷一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

《坟·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卷一

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

《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鲁迅全集》卷六

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

《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卷一

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

《南腔北调集·经验》《鲁迅全集》卷四

在不识字的大众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卷六

倘只看书，便变成书厨，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也就是这意思，……

《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全集》卷三

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全集》卷三

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卷六

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别的书也一样，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

《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全集》卷三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卷一

目 次

学习鲁迅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	黎帆 (1)
向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学习 ——读鲁迅后期的杂文	方泽生 (12)
学习鲁迅 把书读活 ——纪念鲁迅诞生九十周年	周建人 (23)
学习鲁迅批判孔家店的彻底革命精神 ——纪念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诞生 九十周年	罗思鼎 (33)
鲁迅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永放光芒 ——批判刘少奇、周扬一伙政治骗子用唯心论 歪曲和诬蔑鲁迅的罪行	孙逊 (44)
学习鲁迅，彻底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	河北大学中文系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52)
学习鲁迅精神深入批修整风	凌盖 (61)
永不磨灭的革命原则 ——学习鲁迅“痛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	洪愈然 (68)
“我以我血荐轩辕”！	韩振权 (75)
在“先知的光芒”背后	解放军某部 解胜文 (77)

学习鲁迅

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

黎 帆

早在一八八二年，恩格斯就指出：“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真理，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我们党的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史上得到证实，也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两条路线斗争史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文化思想战线上，为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同样记载着在内部斗争中顽强地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的一页。

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将营垒分清

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书信中，曾经明确指出：“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那他对不可避免的斗争的爆发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从来都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

移的。因为这不只是由于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总是力图按照自己的阶级利益、阶级面貌歪曲马克思主义，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在同国民党反动文化的代表“新月派”、“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等枭蛇鬼怪进行激烈搏斗的同时，也坚决地批判了打着无产阶级旗号的冒牌的“革命文学”，尤其是对周扬等“四条汉子”的投降主义及其叛徒、特务嘴脸的揭露，直到今天，还继续发挥着战斗作用，给我们以深刻的教益。

鲁迅一直是在被围攻中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他对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性，有着痛切的感受和透彻的了解。

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者，都把攻击矛头集中指向鲁迅，“四条汉子”及其一伙，在篡夺了“左联”的领导权以后，为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推行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一方面“拉大旗作为虎皮”，一方面又采取谩骂、造谣等各种卑鄙的手段，向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射出一支又一支的暗箭。鲁迅曾这样描述过他背腹受敌的境遇：

“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因此，“为了防后方”，鲁迅就不得不“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但是，革命家的鲁迅，在背腹受敌中，却“毫无退缩之

意”，受伤之后“仍然站起来”，继续战斗。他在斗争中是很清楚阶级敌人这一套反革命策略的。所以，不管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以及文艺战线上的一切枭蛇鬼怪是迎面而来，还是背后偷袭，没有一个能够逃脱开他的锋利的解剖刀。他在战斗的行进中，不时地提醒人们，革命的文学者，“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复的暗探”。鲁迅坚定地号召，革命文艺战线必须把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这就是鲁迅在三十年代革命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最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三十年代处于内外夹攻中的鲁迅，正是这样坚韧、顽强地开展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分清营垒的艰苦战斗。

这首先是一场从理论上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因为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甚至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从“左”的或右的方面来歪曲马克思主义的。

一九二八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出，虽然反映了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促进左翼文艺战线的诞生，有过积极的作用。而且也确如鲁迅所说：在这场论争中，“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有的人跟随革命前进，终于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但是，它的大部分倡导者，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对“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暴力与黑暗”，连“正视”和“抗争”的勇气也没有，却拨弄着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自吹自擂，大搞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特别是用极恶劣的手段集中攻击五四以来革命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

正在走上马克思主义者道路的鲁迅，并没有为这场围攻所吓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赋予了鲁迅以新的战斗生命，使他的匕首和投枪磨练得更加锋利了。正如毛主席高度评价的那样：“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为了戳穿这些所谓“革命文学家”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冒牌货，鲁迅十分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有比较才能鉴别。”他认为，要在文艺问题上“豁然贯通”，“仍须致力于社会主义科学这大源泉的”，只有“深通学说”（指马克思主义），才能“催促”文艺走“向正确，前进的路”。鲁迅诚恳地教育革命青年：要识别假马克思主义的欺骗，就必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在这场斗争中，鲁迅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看出了这一批人的假马克思主

义的实质，并与之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鲁迅完全正确地指出：“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是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因而，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和文艺问题的看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鲁迅尖锐地指出：他们的那一套对于向往革命的青年来说，“并不是滋养品”，而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和在食物中间”的“砒霜”。在文艺与政治问题上，鲁迅揭露了他们虽然高唱“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实际上却是“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大搞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为他们的私利服务。他们公然鼓吹要用他们的思想“化大众”，胡说什么有了“目的意识性”的知识阶层应该“教化”只有“自然生长性”的工农。鲁迅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指出了这批人不过是“乘大潮洗一个澡，算是新人，却不改本体”，指出了他们“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因而，他们笔下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只能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无产气”的资产阶级的冒牌货。

一九三六年，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大论战中，鲁迅同假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性质更为严重的斗争。周扬等“四条汉子”及其一伙，在王明、刘少奇等政治骗子的指挥下，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解散“左联”，鼓吹“国防文学”的投降主义口号，攻击鲁迅根据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无产阶级口号，是对党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

给鲁迅加上了“破坏统一战线”，“搞分裂”等一系列罪名，使用明枪暗箭，再一次发动对鲁迅的围攻。

但是，巍然屹立在无产阶级文化阵地上^的鲁迅，并没有屈服于这伙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压力，坚决地进行了回击。这是一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学说、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严重斗争。斗争的中心是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问题。周扬一伙鼓吹“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应该“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的投降主义谬论。鲁迅针锋相对地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以强调和突出体现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联合战线”的口号。因为新口号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鲁迅还认为：这新的口号，既“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出的，希望这些作家们继续努力向前进”，也是“对一般或右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

在这里，鲁迅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旗帜鲜明地阐明了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内，只能用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领导，决不能迎合和迁就资产阶级的思想。

鲁迅在这场斗争中，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揭破了王明、刘少奇等政治骗子及其走卒周扬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联合战线”的欺骗，坚决地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和理论上鉴别的同志，必须坚持以斗争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尺度，这也是鲁迅辨别和揭露假马克思主义的有力的武器。

鲁迅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带着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来到无产阶级文化阵地的。在几十年的战斗中，锻炼了他的深刻的观察能力，也培养了他的一贯重视实践的最可宝贵的品质。因而，他一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就能运用自如地击中论敌的要害。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一切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管他们给自己装饰上多少漂亮的词句，但只要一接触到斗争实践，就不得不拖出假马克思主义的尾巴来。正如鲁迅所说：“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

在“革命文学”领域中，鲁迅就是从那些号称“革命文学家”们根本脱离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这一特征，识破了他们的伪装的。

这些喧嚣文坛的“革命文学家”们，虽然“摆着一副极凶恶的‘左’倾的面孔”，实际上不过是口头革命派。鲁迅用文字画出了一幅讽刺画，极深刻地揭露了这些所谓“革命文学家”们的可笑嘴脸：他们“坐在半租界里积蓄‘十万两无烟火药’”，忽而钻进“革命咖啡店”，在“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里，“指导‘龌龊的农工大众’”，忽而“爬出日本的温泉，钻进巴黎的旅馆”，“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

鲁迅看穿了这些见稿的所谓“革命文学”，实际上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壳，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他明